

人口流动 · 婚孕 · 生育转变

(美)田心源

近几年来,中国人口流动数量有所增加,速度有所加快,这种状况加深了人口情况的复杂性。在这篇文章里,我先检阅漫读一些国内发表的有关著述。主要是了解在人口流动与计划生育问题上已有的认识和论断;第二个目的是根据可利用的国内资料,用实际数字探索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三段是本文的终结,包括对当前研究成就的评价和建议,以便澄清在实行计划生育过程中流动人口可能带来的问题。

真象与详数

据报道,中国国内合法的和永久性的迁移人数平均每天不过5万人。他们的迁移有多种原因:工作调动、升学、复员或退休军人、转业、投靠亲属、刑满释放等等。按这些原因准许的国内移民每年不到2000万〔张庆五,1988,18〕。象这样的人口流动在过去虽然有限,但从1958年户口登记制度建立后从未中断过。当前每年合法的省内和省际移民总数不过中国总人口的2%。

除了国内移民外,还有其它形式的人口流动,其数目远远超过每天不到5万的合法迁移人口,两者之间的比率为100:1。1988年每天平均有5000万以上人口在这批流动队伍之中〔张庆五,1988,18〕。另据报道,在1950~1982年之间,全国因职业原因要求迁移的人口总数平均每年为100万左右。与此相比,在最近一个年限之间,除政府分配外,因工作与其它原因个体流动人口总数增长约50倍之多〔王玉海,1987,10〕。这批为数众多的迁移者即为近年来激增的流动人口的主体。其中20%以上已找到门路进入23个百万

人以上的都市和大城市〔丁水木,1989,28〕。

不同类型的人群涌汇成了近年来的人口流动巨流。这批人或从事于商业、贸易、服务行业、建筑工作,或寻找工作、旅游等等。寄寓者或暂住人口为其正式指称。寄寓者托身于亲友或安身于工作单位的集体宿舍。按规定他们在居住三个月后应在当地民政部门登记。他们转成合法的居民机会虽有,但是极少。寄寓的长短可能少到几个月,也可能一拖几年或无限期继续下去。他们之中数目不详的一大批因此成为事实上的常住人口〔贾秀嵩,1988,19〕。据估计,这样的暂住人口占一些大城市合法常住人口的10%以上〔许妙发,1989,37〕

除暂住人口之外,其他众多流动者通指为过往人口〔高庆旭,1989,58〕。即这批人进城镇停留一天或几天推销农产品、手工业品等后返回居住地。其总数在各城市中有所不同,计算方法也可能不一致。在拥有340万总人口的5个东南沿海城市境内,过往人口数为26.5万,暂住人口为36万〔许妙发,1989,37〕。1985年,天津市境内每日过往人口至少是该市流动人口的13%。在北京或广州每日流动人超过100万,其中几十万是当天或短期逗留的过往人口〔贾秀嵩,1988,18〕。

中国境内的人口流动包含三种人:合乎户口法规的境内迁移者、暂住人与过往人口。暂住人口与过往人口一般均称为流动人口。

法规上准许的国内迁移已普遍提高,向城市内的迁移人数提高得更快〔仇为之,

1981; 任素华, 1988, 20~1; 贾秀嵩, 1988], 估计1988年总数为2 000万。前面已经提过, 他们仅仅为全国总人口数的2%, 因此, 国内的迁移上升无法单独解释最近对流动人口激增的进一步关注。

暂住人口与过往人口估计总数千差万别, 关键是, 不是所有的甚至不是多数的寄寓者在停留三个月后都自动前往当地民政部门登记。加之过往人口仅在停留地短暂停留, 因而很难掌握他们的准确数字。由此, 当前流动人口总数的估计很可能低于实际数。

当然, 即使流动人口总数仍未确定, 寄寓者和过往人口的膨胀已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超国家人口计划指标的生育胎数在流动人口之中是屡见不鲜的。这种行为已被公认为: “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新课题”〔潘兆文, 1988, 52〕。因而全国省、市和自治区几乎都采取了步骤控制流动人口中的脱僵生育〔黎强, 1989〕。

关心这个问题的前提是, 离原住地外流的妇女(夫妇)会超指标生育。前提的本身不是无道理的。70年代末期制定的省和地方计划生育管理条例中已有处理计划外怀孕后外出躲藏者与有意收留他们的人的内容〔参阅金牛区, 1979〕。因流动人口激增促使更加重视这个问题时, 恰巧人口年龄和婚姻变动正在促使生育率上升。80年代, 这些情况提供了流动人口激增与生育率上升之间好象有关的证据。因此, 流动人口被认为是计划生育政策落实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从理论上说, 这个推断是有问题的。根据所有的报道, 近几年来人口流动的动机、目的是众多而复杂的〔陈玉光, 1988, 18〕。他们的生育和相关的行为多半极不同于前几年怀孕后离家躲避一阵生了小孩再回家的一批已婚妇女。因此, 这个争论必须通过实际数据解决。这即为本文下一节的主题。在实际探索开始前, 先漫谈了解国内其他学者已

有的认识, 特别注重他们对合法的国内迁移者、寄寓者与过往人口上的心得和他们对这三批人的特征、行为的描述与论断。

特征与行为

虽然各方面对流动人口的状况极为重视, 但流动人口影响计划生育落实的幅度仍无数量上的确定。部分原因是, 在生育与其相关行为讨论中, 合法的迁移者与流动人口经常混合在一起, 划分不清。

举例来说, 在无锡区的6个乡、镇中, 1987年1~9月登记结婚的1 832个新娘中, 20%以上来自省外(225人)和省内其它市、县(146人)。报道中没有提供后146个新娘的年龄资料。在省外来的新娘中, 将近2/3在结婚登记时是在23岁以下。但在1 607个从省、市内来的新娘中相应的比例仅为39%〔无锡市, 1988, 31〕。

这种资料提供方式间接地支持了流动人口行为经常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观点。但因为忽略了重要因素, 无助于准确反映流动人口对计划生育的影响。省外来的新娘有无合法的身份? 更重要的一点是, 假如她们为法规允许以外的迁移者的话, 她们是寻找好条件的寄寓者还是过往人口呢? 报道的暗示是, 多数好像是在亲戚朋友替她们定好了婚契应约而来的〔无锡市, 1988, 30〕。这些新娘是链环迁移人口的一部分, 虽然没有一定法规上的身份, 但不应该把她们统视为流动人口。

报道上对娶她们的男人毫无描述, 从这批男人的观点来看, 在其它品质无差别的情况下, 他们向“红娘”提出的要求将是比自己年轻的女孩。这可能是外省来的新娘中23岁以下占高比例的原因之一。这种年龄的选择可能是原住地大多数年龄高于23岁的妇女都结了婚, 因而无卷入长途婚姻安排的可能。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 所谓的“婚姻市

场”是双方交易的场所。年龄上的选择可能人为地压低在常住乡、镇内登记的婚姻中23岁以下新娘的比例。报道说,这6个乡、镇一共娶进了371个23岁以下外来的新娘。是不是有一批年龄相同,人数较多的妇女从这6个乡、镇同时期内嫁给了邻近乡、镇的男子呢?这批嫁出去的新娘将在她们迁入地登记结婚。因而,这批年轻新娘的迁出将机械地提高在常住乡、镇中登记中23岁以上新娘的比例。

再一点是,从省内其它地区嫁进来146个新娘迁移的距离比省外来的要短得多。她们之间的流动过程也可能有所差别。他们很可能以前已是这6个乡、镇的寄寓或过往人口。

最后,假如所有省外和省内其它地区来的新娘都留在常住地的话,她们会不会在23岁以前结婚呢?也就是说,她们低龄结婚的行为是不是和从未离开过乡、镇的姐妹相同呢?这些问题是有必要获得答案的。原因是,在80年代的近几年中,在中国各地区,23岁以下的婚姻普遍增多。

因而,当资料仅限于流动人口时,对人口流动引起的直接影响是无法整体和正确掌握的,同时应有关于在迁出、迁入两地的非流动人口或常住人口的特征和行为资料。只有这种资料才能画清“汉界楚河”,以便测量和分析寄寓者、过往人口与非流动者(常住人口)在行为上的差别。

寄寓者的婚姻行为可能有所不同,可从1985年北京流动人口调查推断出来。这涉及2396户居民的调查表明,1/5的居民家庭中有一个寄居篱下的保姆。其中15~24岁的妇女占多数〔高庆旭,1987,31〕。在分析中,寄寓者(暂住人口)与过往人口未被标明,也缺婚姻资料。根据报道分析,大多数年轻妇女仍是单身者,而且将会继续如此一段时间。真是如此的话,人口流动将使这些妇女稍迟结婚或较长期的不婚。

另外,1986年对浙江三市一镇1541户居

民调查分析表明:“移民的生育量低于非移民……,仅考虑已有婚育史的妇女,移民和非移民的生育量分别为2.21和2.90……,大于或等于50岁的移民妇女3.52的终身生育率,非移民则高达4.29”〔王嗣均、吴汉良,1988,6〕。但分析中未提出婚姻年龄和婚史长短的详数,也没有详细说明在什么情况下这些妇女成为有关居民户的成员。有些人早在1949年就迁进去了,多数是过去37年中逐渐移入的,其余的仅在年内才迁来。虽然生育率差别方向暗示人口流动对生育的消极作用,但分析上也应当考虑到其它变量对生育的影响。

上述的地方性调查提供了对目前情况有启发但零星的描述。因而,解释人口流动与生育二者的关系仍然多为推测,这主要是因为尚无有系统的调查来取得可用于论述这些课题的资料。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协同省级院校完成了第一个大幅面国内人口迁移调查。调查包括16个省、市的74个城、镇。初步分析估测了1949~1986年期间总迁移量、年迁移数和迁入五种类型目的地比较人数〔陈玉光,1988〕,这批目的地是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镇。调查者也鉴定了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陈玉光,1988;王维志,1988〕。

在流动人口中,主要为15~29岁者。分别占进入上列5个类型城区人数的55%、61%、60%、57%和46%。按性别分,男性流入第一三四类城区人数较多;妇女则多流入大城市和镇〔马侠,1988;王维志,1988〕。这个调查填补了在对过去37年中迁移人口特征认识的空白,也提供了可用于比较“迁入者”和迁入地“非移动者”生育行为的资料。

1986年调查提供的回顾性生育资料表明,30~49岁迁入者的年龄别生育率稍高于与她们年龄相同的非流动妇女,但在50岁以

上妇女中,生育是与此相反的。虽然如此,30岁以上迁入妇女间的总平均生育子女数(2.98)低于迁入地的非流动妇女生育数(3.20)。研究者说:“我国城镇移民和非移民的生育水平大体上是相同的”。他把这种生育上的相似情况归因于:(1)“迁入者与原居者在社会、经济、生活习俗等许多方面已经保持了融通关系,”即“文化适应”效果;(2)“城镇地区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较早,移民受生育政策的约束也较迁出地为严”,即计划生育指标落实的作用,再进一步说,“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结果指明,迁入城区者的生育已低于农民。因此,迁移对生育率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杨子慧,1988,12〕。

在30~34岁年龄组的迁入城区的妇女中,一胎率与城市规模大小成正比。一胎数在总胎数中的比例从迁入特大城市者的84%降到大城市的71%,中等城市的62%,小城市的58%,镇的53%。二胎与多胎率则与城区规模成反比,从特大城市的16%上升到镇的47%。研究者说,胎率差比的主要原因是,自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村人口大批涌入城镇。这批农民只最近才进入城区,尚未适应城市文化或还未受其熏陶,因而仍保持一部分农村生育观念与行为。同时小城镇的生育政策和管理宽松于特大和大城市〔杨子慧,1988,14〕。

1986年调查资料还表明,除一例外,移民和年龄相同的城镇非移民的胎次率和胎次分布类似。即居住的城市越大,非移民的一胎率越高;反之,居住的城区越小,他们的二胎、多胎率越高。例外的情况是,在小城市居住的非移民中,他们的一胎率稍高于中等城市的非移民〔杨子慧,1988,14〕。这些分析是很令人感兴趣的。值得注意的题目有两个:这些情况是不是反映在中国城市中已存在生育转变上的差别呢?即生育观念与行为“自觉性”的改变幅度与城镇规模大小

成正比的。与此有关的问题是,镇的大小有相同的关系。当然此双重解释是于近几年中国生育率升降的来龙去脉相吻合的。但“自觉性”与“诱催性”变动的相对影响程度探索,在整个中国人口移动格局中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关于过去37年中国国内迁移者的特征和行为,1986年的调查分析已作了清晰的显示。同时,分析的结果也揭示了人口流动对生育影响的一系列观点。有的观点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是积极的。从1986年调查分析得到的一个结论是:“我不认为迁移是降低生育率的新式避孕药,但最少是一种途径”。当人离村入城之后,他们会面临和接受生育节制的〔杨子慧,1988,15〕。而有的观点语气和用词都较严苛,斥责早婚、早育、未婚先孕及超生现象盛行于流动人口之中。如“有的夫妻双方到城市做工,有的是有意躲避计划生育,致使外流人口成了一支庞大的多生、超生游击队”〔朱庆芳,1989,29〕。这个超生游击队中的一些人盲目生育,甲地生完乙地生,到处钻计划生育管理的空子……据村干部反映,这些流动户不少是男女混居一室,甚至都搞不清楚谁和谁是一家,更谈不上合法结婚登记。尤其在生育方面,不见男孩不收兵,生了女孩不是送人就是送回老家〔张颖,1989,23〕。

意见上的分歧也许只表示透视与解释上的差别。如前所述,近几年生育因种种原因回升,恰巧流动人口近年来也同时激增,在流动人口中落实计划生育指标的实际困难也有所增加。在困难蔓延的背景中,流动人口的生育行为得到了消极的渲染。但尚未具体证明人口流动对计划生育的短期负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时的计划生育落实是刻不容缓的,因此,人口流动在长期过程中参与降低生育作用的正确评价也受到阻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前人口流动可能引起的影响非要到一段时间以后才能测定。

1986年调查分析提出了人口流动在生育行为上有比较积极的影响的论断。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其根据是一批移民和非移民在37个漫长的年头中的行为。

当前的意见分歧也可能是因为另两个原因,一是缺乏决定性的资料,二是在划分移民、非移民与流动人口的定义上各有所别。近几年的地方调查提供的资料的完整性一般是有限的,1986年的大规模调查澄清了一些情况。美中不足的是,应该但未收集原住地非移民的“现时”生育情况资料,以便在流动者的行为上作比较评断〔杨子慧,1988,11~12〕。

除了抽样量大小和询问幅面问题之外,不易确定的有关重要情况好像散在于最近的分析之中。在一些地方性的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资料中,无法确定过往人口是否与寄寓者混在一起,同时也不清楚1986年调查中所指的移民是否有别于当前流动人口众多的组成分子,也无法了解他们是否只与寄寓者相似。如不同的话,移民和寄寓者在文化教育、职业、流动动机等方面有何差别仍是问题。

另外,还有一点不清楚,即1986年调查采用的移民和非移民是否是两个相互不犯的范畴或科学上稳健的定义。在调查问卷解释中,常住人口包括:(1)户口在现住地址者;(2)户口在外地,但自1949年起在现址继住一年以上者。在定义上暂住人口为户口在外地,但在现址居留一天以上,一年以下者,但在移民或非移民上并无明确定义。在调查统计数据列表之时,暂住人口是否与第(2)范畴的常住人口合并在一起算为移民了呢?假如是的话,现址居留较长和较短时期的人数混在一起,可能是使人口流动在行为上作用不明显的原故。假如并非如此的话,把暂住人口排斥在分析之外,在科学上也是有其缺陷的。原因是人口流动是有其选择性的,即近几年中出现的暂住人口无疑

地包括极高比例的婚龄和育龄年轻男女〔马侠,1988;王维志,1988;杨子慧,1988,11〕。因而,暂住人口,特别是年龄在15~29岁之间的人口,必需澄清并包括在分析人口流动与婚姻和生育的关系之内。这是极关键的一举,原因是人口流动在婚姻和生育上的作用仅在“现前”时间内显示出来。

对用1986年调查资料的“移民”与“非移民”生育的分析只限于30岁以上的妇女。比她们年轻的妇女被删掉的原因是,她们尚未进入生育年龄或是仍在能生育的旺盛期中,因此在一个以“完全生育率”测量为主的分析中,她们是无存身之地的〔杨子慧,1988,17〕。她们被排除在外也可能是由一个未表明,但暗示出的实情引起的,即众多年轻的妇女对生育情况没有作出回答。

婚姻与生育

本节的探讨由于采用已印发的1986年调查资料,因此便受印发数据安排的格式之限〔人口研究所,1988〕。1986年调查数据分5个城区类型: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镇。据了解,第一类型城区人口在100万以上,其它城区类型人口为50~100万、30~50万、10~30万、5~10万〔魏津生,1987,22〕。

本探讨也遵循1986年调查制定的迁移身份定义,即(1)“移民”指自1949年合法迁入现址者或户口在外地,但自1949年起在现址已继住一年以上者;(2)寄寓者指户口在外地,但在现址居住一年以下者;(3)常住人口指户口自出生或户口登记制度建立时即在现址者。

表1表明了按城区类型和15~49岁单身与已婚妇女的移民身份计算出来的百分比。如预料的,单身妇女集中于15~19和20~24岁两个年轻年龄组内。可是,在常住人口、移民与寄寓者之间存有辨别得出的变量。城镇移民中15~19岁单身妇女占48%或以下,

例外的是迁入大城市的移民占58%。迁入中等城市、小城市和镇的妇女移民多在20~24岁之间。但是,这个年龄组的妇女较少迁入特大城市,更少在其中定居(19%)。迁入第一二类型城区的单身妇女中,19%与27%在25~29岁年龄组内。总的来说,女性移民迁入城、镇的年龄高于同性别的城市常住人口或寄寓者。

表1 中国1986年单身与已婚妇女依年龄、居住身份和现住城镇计百分比

年龄与 现住地	单身			已婚		
	常住者	移民	寄寓者	常住者	移民	寄寓者
15~19						
特大城市	41	34	52	0	0	1
大城市	51	50	59	0	0	0
中等城市	55	43	49	0	0	0
小城市	55	46	59	0	0	0
镇	58	48	58	0	0	3
20~24						
特大城市	45	43	41	11	4	11
大城市	42	19	41	13	7	38
中等城市	40	50	43	12	5	28
小城市	39	48	41	17	7	20
镇	37	45	40	18	9	23
25~29						
特大城市	11	19	3	28	15	20
大城市	6	27	0	12	15	21
中等城市	5	5	6	25	18	21
小城市	5	5	0	20	19	39
镇	4	5	1	24	18	15
30~34						
特大城市	2	6	4	25	24	20
大城市	1	4	0	22	24	21
中等城市	0	1	1	24	21	16
小城市	1	0	0	22	21	17
镇	1	1	1	21	22	18
35~39						
特大城市	1	2	0	15	19	25
大城市	0	1	0	18	21	14
中等城市	0	1	0	17	20	14
小城市	0	0	0	16	21	7
镇	0	0	0	16	19	18
40~44						
特大城市	0	0	0	11	18	12
大城市	0	0	0	10	14	3
中等城市	0	0	1	12	17	14
小城市	0	0	0	14	16	7
镇	0	0	0	10	15	13
45~49						
特大城市	0	0	0	10	20	12
大城市	0	0	0	8	18	3
中等城市	0	0	0	9	19	8
小城市	0	0	0	11	16	10
镇	0	0	0	11	17	10

资料来源:《中国1986年74城镇人口迁移抽样调查资料》,《中国人口科学》1988年专刊(2)。

年龄稍高的单身妇女较多地迁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原因仍然模糊不清。据了解,包括在1986年调查中的大城市多为新建工业

城市〔马侠,王维志,1988,332〕。单身妇女较多地涌入这些地区可能是因为职务调动或学习与技术训练完后工作分配引起的。很明显,将来的分析必需仔细考虑她们的教育水平、职业和有关情况。

同时,众多年龄较高的单身妇女加入人口流动洪流中是值得强调的,这个情况可能反映人口流动与婚龄高低的直接关系。已婚妇女百分比数据(见表1右栏)再次强调这个关系存在的可能性。在年龄上,单身妇女移民比城区常住人口或寄寓者高,在中国城、镇中的已婚妇女移民中,20~24岁的已婚女青年只占4~9%。换句话说,20~24岁妇女移民的已婚率与城区常住人口和寄寓者有实际的差异。除了在5个城区内的两个例外,25~29岁已婚女性移民的百分比(15~19%)也低于其他同年龄的妇女。加之,这些百分比仅极低限度地高过20~24岁城区常住妇女已婚的百分比(11~18%)。

可是,在近几年来刚立足于城、镇的另一群妇女中,可观察到较复杂的年龄和婚姻形态。一方面如表1所示,年纪最轻的一群人是寄寓者。在小城市和镇内寄人篱下的那些妇女中,多至58~59%是15~19岁单身女寄寓者。在这5个类型的城、镇中寄寓不到一年的单身妇女,92%甚至100%都不到25岁。总的来说,依人篱下的单身妇女不但比城、镇常住妇女年轻,而且她们的岁数也更低于合法迁入或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的女性移民。

可是,在行为上不同于移民的一点是,众多的寄寓者在25岁以前就成了有夫之妇。再者,与年龄相同的城区常住女性比,多数20~24岁的寄寓者也已经结了婚。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内寄寓的20~24岁的妇女中,已婚情况特别普遍,达28%和38%之多。比年龄相同的城区常住妇女(12%和13%)要高2~3倍。移入镇的小部分寄寓妇女(3%)在20岁以前就已经完婚,在常住和移民妇女

中, 如此早婚却无出现。

移民妇女和寄寓妇女虽都属于流动人口, 但却显著地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与行为。单身妇女移民的年龄一般是较高的, 多数单身寄寓妇女却还不到20岁。从行为上观察, 妇女移民在25岁以前一般是未婚的, 但在20~24岁的女寄寓者中已婚是常见之事。因此, 现有资料好象既不证实也不否定人口流动与婚龄间可能存在的积极关系。

表2内的数据只限于城、镇区常住女性和女性移民。大批年龄低于20岁的妇女未回答问卷中关于生育情况的问题, 她们忽略了这

些问题至少是和她们尚未出嫁的情况一致的(见表1)。但是早育在十几岁的妇女中仍有少数实例。

在20岁以后, 如预料的那样, 生育次数在各年龄组内是有差别的。但是在两个最高年龄组(40~44和45~49)的城镇常住与迁入妇女中, 生育型态几乎相似, 是一目了然的。这些妇女在二三十年前, 即1957~1966年之间开始生育。在所有的城镇区之内, 60%或甚至80%的40岁以上的常住人口与移民有3个或更多的孩子。虽然在40~44岁的特大城市常住妇女中, 只生了一个孩子的比例

表2 1986年中国依年龄、孩数、居住身份和现住城镇计百分比

年龄与 现住地	常住者					移 民							
	%	人数	孩数			%	人数	孩数					
			1	2	3			4+	1	2	3	4+	
15~19													
特大城市	—	[2]	—	—	—	—	[0]	0	0	0	0		
大城市	—	[0]	0	0	0	0	[1]	—	—	—	—		
中等城市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城市	—	[1]	—	—	—	—	[0]	0	0	0	0	0	0
镇	—	[3]	—	—	—	—	[0]	0	0	0	0	0	0
20~24													
特大城市	100	[254]	92.5	6.3	0	1.2	100	[64]	89.1	7.8	1.6	1.6	
大城市	100	[41]	95.1	4.9	0	0	100	[32]	87.5	12.5	0	0	
中等城市	100	[93]	84.9	14.0	1.1	0	100	[27]	92.6	7.4	0	0	
小城市	100	[84]	97.6	2.4	0	0	100	[35]	88.6	11.4	0	0	
镇	100	[38]	89.1	9.4	0.7	0.7	100	[105]	82.9	11.4	1.9	3.8	
25~29													
特大城市	100	[1134]	94.9	4.7	0.4	0.1	100	[458]	93.7	5.2	1.1	0	
大城市	100	[149]	89.3	9.4	1.3	0	100	[145]	93.8	4.1	2.1	0	
中等城市	100	[354]	83.3	16.4	0.3	0	100	[221]	80.5	15.4	3.2	0.9	
小城市	100	[169]	89.3	10.1	0	0.6	100	[167]	86.2	11.4	1.8	0.6	
镇	100	[280]	80.7	16.8	7.2	2.9	100	[300]	75.0	22.7	2.0	0.3	
30~34													
特大城市	100	[1163]	86.8	11.6	1.2	0.4	100	[831]	84.5	12.8	2.5	0.2	
大城市	100	[133]	63.9	29.3	3.8	3.0	100	[266]	71.1	21.4	5.6	1.9	
中等城市	100	[400]	63.3	28.5	6.8	1.5	100	[277]	61.7	30.0	6.5	1.8	
小城市	100	[213]	63.8	32.4	3.3	0.5	100	[214]	58.4	33.6	6.5	1.4	
镇	100	[277]	52.0	37.9	7.2	2.9	100	[418]	52.6	33.0	11.5	2.9	
35~39													
特大城市	100	[736]	52.6	37.8	7.7	1.9	100	[678]	47.9	37.2	11.7	3.2	
大城市	100	[112]	18.8	43.8	25.0	12.5	100	[236]	25.8	45.3	22.5	6.4	
中等城市	100	[291]	23.7	43.0	20.6	12.7	100	[283]	29.0	45.9	14.5	10.6	
小城市	100	[159]	16.4	54.1	24.5	5.0	100	[218]	21.6	45.0	23.9	9.6	
镇	100	[215]	19.1	45.1	23.3	12.6	100	[374]	21.9	38.5	23.8	15.8	
40~44													
特大城市	100	[552]	17.2	49.8	23.2	9.8	100	[492]	10.6	51.6	25.6	12.2	
大城市	100	[66]	9.1	16.7	30.3	43.9	100	[153]	3.3	34.6	37.9	24.2	
中等城市	100	[214]	4.7	35.5	32.2	27.6	100	[236]	6.4	33.9	25.0	34.7	
小城市	100	[132]	3.8	31.8	35.6	28.8	100	[181]	3.9	23.8	45.3	27.1	
镇	100	[141]	4.3	27.0	30.5	38.3	100	[289]	4.2	28.0	30.4	37.4	
45~49													
特大城市	100	[495]	5.7	31.3	31.1	31.9	100	[690]	4.2	31.2	38.0	26.7	
大城市	100	[56]	3.6	19.6	26.8	50.0	100	[216]	2.8	16.7	33.3	47.2	
中等城市	100	[158]	6.3	21.5	28.5	43.7	100	[271]	2.6	19.2	33.9	44.3	
小城市	100	[122]	1.6	21.3	27.9	49.2	100	[176]	2.8	14.8	27.8	54.5	
镇	100	[157]	2.5	14.6	26.8	56.1	100	[349]	1.4	10.9	26.9	60.7	

资料来源: 同表1。

稍高(17.2%),但在不同居住地或流动身份的老年妇女中,生育可以说是一致趋高的。另外,与常住妇女对比,移民多胎生育比例较高,在3胎和3胎以上。迁入小城市和镇的妇女生育数量为最多,其中55%~61%是4个或更多孩子的母亲。然而并无证据表明,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当这些妇女进入育婴阶段时,人口流动在生育上曾有任何负作用。

25~29岁的妇女约在1977~1981年间进入育龄阶段,恰好与中国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一举巧合。证据表明,在城区常住与移民妇女之中,多胎生育率普遍降低。在35~39岁的镇区常住妇女中,13%的人仍生了4个或更多的孩子,显著地低于40~44岁(38%)和45~49岁(56%)的妇女。多胎生育率在35~39岁的妇女移民中,也有相似或较突出的降低。在25~29岁的城镇常住与移民妇女中,生育上的转变情况则更为引人注目。

可是,在25~29、30~34和35~39岁年龄组的妇女中,并无表示人口流动与生育间的反作用的鲜明数据。除一例外,在35~39岁的移民中,只有一个孩子的妇女比例是较高于年龄相同的城镇常住妇女的。不过前者的生育一般是高于后者的。从特大城市到镇,2胎、3胎和4胎以上的生育率是相当可观的。但无论迁入地如何,妇女移民的2胎、3胎或4胎以上的生育率都较常住妇女为高。在1977~1981年进入育龄阶段的25~29岁妇女移民中,有两个或3个孩子的母亲的比例,要高出年龄相同的城镇常住妇女。

20~24岁的妇女移民的生育一般也高出相同年龄城镇常住妇女。除了那些迁入中等城市的妇女之外,二胎和多胎生育率在移民妇女中经常是高于城镇常住妇女的。将近2%迁入特大城市的妇女,在25岁以前就有了3个、4个或更多的孩子。迁入镇的妇女生育率更是高于常住居民。其中3胎和4胎以上生育率比镇内常住妇女高2~5倍。

现有资料充分反映了中国计划生育取得的巨大成就。其它方面也极有启发,特别是在人口流动和生育行为负作用的关系上,提供了发人深思的数据。

含义探讨

上一节中的数字是发人深思的。怎么一批迁入特大城市和镇的妇女不到25岁就已经有了4个或更多的孩子呢?当然,这些生育最多的妇女可能在迁入城镇以前就已生完了所有孩子或其中的几个。如是这样,众多的妇女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当母亲了。这种早育现象并不普遍,且多半发生在农村。在妇女移民中的多胎生育行为可能是她们最近才离乡入城的原故。但她们的背景对生育的影响如何,目前还不清楚。阐明是否实如所料,必须有适当的数据,才能掌握移民从何处来,离开原住地时的年龄,在现住地居留多久,等等。

如此的解释是与大卫·苟德柏哥的“二代城市居民”假设一致的。[Gold-berg, 1959、1960]。其根据出于“早期社会化”和“文化适应”理论,简短的说,因为农村启蒙、文化熏陶背景,离乡入城的妇女移民生育率会高过生长于城市内的妇女,假如她们仍呆在农村的话,她们的生育率当如村内姐妹一样高。这种可能性本身是极引人兴趣的,特别在中国更是极诱人推测不止的。

移民,按定义讲,并非目前“流动人口”的一部分。他们在城镇内现址居留是合法的或已在一年以上的。20~24岁的妇女移民,刚进入并且仍在最旺盛育龄阶段之内,如可能,实际上已经有超生育指标的行为,那么不易捉摸的寄寓妇女更可能有相同的表现。因此,很容易了解为什么近几年人口流动激增促进了对流动人口生育加强警惕的号召和措施。可是,假如年轻的女性移民和寄寓者未离原住地的话,她们的生育仍会与村内未迁出的妇女毫无区别。省级计划生育工作者

已提供了与此有关的零星数据〔王希哲, 1989, 36~37〕。从农村生育行为上来看, 流动人口中的“脱僵”生育情况总起来计, 对全国生育率的影响可能是极微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通过数据才能获得。最需要分析的是, 移民与留在原村或原地妇女生育上的对比, 分析对象的年龄、婚姻情况、教育水平等等, 也必须表明, 以便获得较正确的结论。

在城镇内流动人口激增, 当然给计划生育措施落实增加了很多麻烦, 同时也给城市管理和建设方面增加了很多困难。这种种困难是行政方面的问题, 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但是行为科学上隐晦的理论问题探讨和解释, 能帮助解决政策落实过程中的困难。当前掌握的结果虽然有限, 但流动人口对中国目前计划生育的影响这一问题, 还是可以进一步观察的, 这便是本探索中的首要理论问题。

如前所说, 现有资料并未证实, 人口流动对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进入育龄阶段的妇女的生育行为有何影响。即使在1967~1981年内开始生育的妇女中, 也无表示人口流动与生育间反作用的鲜明数据。从现有数据看, 两者预期的后果好像是不存在的。在现住地和年龄相同的情况下, 移民妇女与城镇常住妇女对比, 前者有较多的多胎生育(见表2)。这可能是因为计划生育措施在城镇执行得比较严格。正因如此, 在城镇生长的妇女的生育率较外来移民生育率易于降低。假如计划生育在城镇里抓的不那么紧的话, 城镇常住妇女的生育率也可能偏高。在那种情况下, 移民妇女的生育率就不会比流动人口的假定负作用差别太大。

人口迁移身份和婚姻行为是有一定关系的, 但现有数据是存在矛盾的(见表1)。与城镇常住居民比, 单身妇女移民的年龄一般较大, 已婚的妇女移民多在25岁以上。人口流动好像抑制了很多妇女移民早婚。单身寄

寓者不但比城镇常住妇女年轻, 而且她们的“青年状态”与现住地相同的妇女移民对比, 也更加显著。这个差别是引人注目的, 但根据人口流动中的年龄选择性, 是很容易解释的。这些十几岁和20来岁的单身寄寓妇女, 当她们面对城市生活的现实时, 推迟婚姻是极有可能的。但必需看到, 另外还有众多不到25岁的寄寓妇女都已是夫之妇了, 她们不同于妇女移民, 早婚者较多。总的说, 在年龄上, 妇女寄寓者与期望是一致的, 但在“百年大事”上, 她们的作风是出乎预料的。从选择性和行为两方面来说, 寄寓者是不是一个不同内质成份拼成的人群呢? 因此, 把划在这个范畴内的流动人口与城镇移民直接对比, 是不是在分析过程中不太妥当呢?

“移民”按1986年调查的定义, 指在自1949年到1986年合法迁入现址者和在这漫长的37年间任何一年迁入现址, 居住一年以上但无户口者。在这段时期内, 因大量军政人员应命调动, 工厂、高等院校整体迁入内地省份, 大、专毕业生统一分配, 严格控制农村人口盲目外流, 动员青年上山下乡等全国性的广泛措施, 加上政治、经济上的转变, 对人口流动的方向和数量有极深刻和具体的影响。在这规范之内, 移民在这些年月之间的处境和经历必有较大差别。虽然他们的背景和动机极不易猜测, 但他们的迁移显然必定多为“集体性”行动。

与此对比, 寄寓者入城镇可能全为“个体性”的行为。他们的动机以经济原因为主。他们的原住地多为农村和小城镇。如前所说, 他们在城镇内居住时间仍是极有限的。因而, 他们的流动经历定与移民大有出入。再者, 寄寓者大多好像为在合法家庭户口中有一席之地者。他们可能并不代表流动人口整体, 也不可能代表分散于城镇的暂住人口。

从现有资料中无法提出对一些问题的答案。比如, 年轻的单身寄寓妇女是否很快就会结婚? 或者, 她们会不会采取与晚婚移民

同样的步骤?这些情况只能通过将来的调查才能了解。另外,年轻的已婚寄寓者在1986年调查时,究竟已经有了几个孩子?这个数据假如能得到的话,应该抓紧利用。她们的生育次数会不会与农村、小城镇内未外流的妇女一样高呢?或者,她们是否会采取城市生育作风呢?这样的问题现在无法回答,局部的原因是,他们丈夫的所在地不明。假如他们的丈夫没有随之而来的话,单人依人篱下妇女生育情况可能因此有所转变,否则她们的生育可能极少反映人口流动的负作用。

人口流动与婚姻、生育间的相互关系当然是极复杂的。本文的目的在于,在温读国内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后,根据获得的资料进一步论述它们之间的关系。然而,很多的空白仍然存在,由于对流动人员的定义有所不同,掌握其实数也就成为并非易举之事。再者,建立可用于测量人口流动影响的具体指标仍无从着手。有关农村外流妇女的婚姻、生育行为数据极少。因此,流动人口对中国整体的影响还无法掌握。

总之,本文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动机并非为否定在人口流动与婚姻、生育问题上的已有认识和论断。1986年调查已表明其关系中的几个主要方面。来自这个调查的资料重整之后,定可促进对建议的深入考验;进一步合作,定可加强对生育转变在中国计划生育规范中的趋向与内容的认识。

参考文献:

- 陈玉光:《论供给制约型劳动市场与我国城镇人口迁移问题》,《人口与经济》1988年第3期17~22页。
- 仇为之:《对建国以来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人口与经济》1981年第4期8~13页。
- 丁水木:《户籍管理与社会控制》,《社会》1989年第3期26~29页。
- 高庆旭:《北京市区居民家庭内寄住流动人口调查分析》,《人口研究》1987年第2期31~35页。
- 荷德柏哥·大卫(Goldberg David): "Another look at the Indianapolis Fertility Data,"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38(1): 23~26, 1960。
- 荷德柏哥·大卫(Goldberg, David): "The Fertility of Two-generation Urbanites," *Population Studies*, 12(2): 214~222, 1959。
- 官希魁:《中国现行户籍制度透视》,《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32~36页。
- 胡善谨、廖琳:《乡镇企业发展与计划生育》,《人口与经济》1988年第6期10~12页。
- 湖北省钟祥县人民政府:《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人口与经济》1988年第4期33~34页。
- 贾秀嵩:《对京、津、冀间人口移动的思考》,《人口与经济》1988年第4期16~19页。
- 金牛区革命委员会:《关于贯彻“市革委会关于贯彻执行省革委会‘关于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的几点意见”补充规定(试行)》,金革发(79)075号。
- 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我国人口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人口与经济》1988年第3期59~61页。
- 黎强:《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研究所。
- 路遇:《山东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年。
- 马侠、王维志:《中国城镇人口迁移调查研究报告(代序)》,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编《中国1986年74城镇人口迁移抽样调查资料》,《中国人口科学》专刊(2)1988年第2~14页;327~347页。
- 尼加:《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人口与经济》1989年第1期33~36页。
- 潘兆文:《扬州市流动人口现状分析及计划生育管理对策的探讨》,《人口研究》1988年第5期52~54页。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中国1986年74城镇人口迁移抽样调查资料》,《中国人口科学》专刊(2),1988年。
- 任素华:《我国人口迁移情况》,《人口研究》1988年第3期19~23页。
- 邵伯良:《试谈商品经济发展与加强流动人口生育管理》,《人口与经济》1988年第5期24~25页。
- 王向明:《人口迁移和流动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人口与经济》1988年第2期19~24页。
- 王嗣均:《浙江杭、宁、绍、峡四市镇人口迁移和流动特征初析》,《人口与经济》1988年第4期3~9页。
- 王希哲:《对农村百户计划外生育户调查的分析》,《人口与经济》1988年第4期36~37页。

(下转第32页)

的实践证明,中国计划生育组织网络的建立,保证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和人口计划的完成。

(四)坚持国家指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努力做好宣传教育和节育技术服务,始终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原则。国家负责制定计划生育方针、政策、法律和人口发展规划,并且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提供保证。政府和一些民间组织,向群众提供宣传教育和节育技术两方面的服务。宣传教育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一个中心环节,多年来中国坚持以宣传教育为主,向群众普及人口与计划生育的科学知识。节育技术服务主要是对育龄人群进行避孕节育技术指导,向群众免费提供避孕药具、节育手术,开展优生优育的技术和咨询服务。目前全国已建立2000多个县级计划生育服务站,22000多名工作人员,他们在广大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提高避孕节育技术,国家把计划生育科学技术列为重点研究课题。从生物医学的基础、临床到工厂试制,组织全国的技术力量进行研究,以期改进提高现有的避孕节育方法。“六五”期间,我们已取得了21项重要成果,饮誉国内

外。

在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和节育技术服务中,我们一贯强调要尊重群众,依靠群众的自觉自愿,反对简单生硬和任何形式的强迫命令,注重社会效益。实践证明,我们采取的宣传教育和节育技术的方向是正确的,效果是好的,保证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另外,中国还广泛开展了国际合作与交流,得到了联合国人口基金、国际计生联和其它一些国际人口与计划生育组织的支持和帮助;还与一些友好国家的政府与民间组织开展了双边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经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

综上所述,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初步获得了一些经验,但是中国面临的人口形势是严峻的,控制人口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总结新经验。同时,我们也愿意与各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界的朋友们一道对全世界面临的人口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共同为稳定世界人口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责任编辑:朱犁)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上接第23页)

王维志:《中国七十四市镇迁移人口年龄构成初步分析》,《人口与经济》1988年第3期11~16页。

王玉海:《试析中国人口流动机制》,《南开经济研究》(增刊)1987年第9~18页。

吴国祿:《从十个固定观察点看山西人口增长状况及其控制》,《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2期50~55页。

魏津生:“China's Urbanization, 1950—1985”,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opulation Problems, Tianjin, October, 1987.

无锡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1832名新娘情况调查》,《人口研究》1988年第3期30~32页。

许妙发:《从人口流动看户籍管理体制的改革趋势——东南沿海五城市的考察报告》,《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37~40页。

杨子慧:《中国城镇移民生育状况的分析》,《人口与经济》1988年第4期10~15页。

张庆五:《关于人口迁移与流动人口概念问题》,《人口研究》1988年第3期17~18页。

张颖:《关于北京市丰台区“浙江村”流动个体户计划生育问题的调查》,《人口与经济》1989年第3期23~25页。

赵玉贵:《重视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人口与经济》1988年第2期5~6页。

朱庆芳:《城乡差别与农村社会问题》,《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2期26~33页。

(本文责任编辑:汪正鸣)

(作者工作单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系)